

《长征行》出版后，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曾列北京畅销书排行榜前茅，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不少报刊选登书中的章节，上海《解放日报》予以连载。

那么，这部书为什么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在众多的长征题材的图书中独树一帜，并在党史研究界有一定的影响？

“走走党史”的“第一桶金”

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必须对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研究开始，他重要的历史论点都是以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事件为根据的。这意味着只要可能，他就不能只局限于间接的“二手”历史材料，为了掌握全面、客观、生动、真实的第一手历史素材，他必须考察曾经的历史遗存，感受曾经的历史事实和事件，乃至获得直观的材料。

石仲泉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党史研究，深知如果不作深入的党史考查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书，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差，可读性差。在《长征行》的前言中，作者提出“走走党史”的原因——“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可能，应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在《百年潮》开设的“走走党史”专栏开篇中，石仲泉再次讲：“‘走走党史’，为什么要从长征路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在研究党史中，又产生了要‘走走党史’的想法，怎么走呢？这有一个选择问题。在青年时代，对长征就很向往；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认识更清楚了——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80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为此，从2001年开始，作者利用6年的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足迹遍及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和赣西南等地，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

通过实地考察，石仲泉亲身感受到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有了新的感受，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对于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丰富了对红军长征历程的认识，澄清了一些长征史实。按照石仲泉的说法，出版《长征行》，是他从“走走党史”到“发掘党史”的“第一桶金”。

关于长征的新看法

石仲泉长期从事思想理论和宏观党史研究，他希望自己来一个从宏观党史研究到微观党史研究的转变。《长征行》，即是他转入微观党史研究的开篇之作，也是他对如何写党史进行的一种新尝试。

无论是重走长征路，“亲历”红军曾经的悲壮史实，还是通过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论写成《长征行》，在“走走党史”中，作者告诉了我们：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长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体现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

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表现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反映了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异常珍贵、伟大、丰沛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的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体现。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和调查者，他的历史书写要从他所掌握和描述的材料中挖掘历史的内在规律，发现历史的真相，填补材料中的空白，构筑对历史的判断和认知。石仲泉说，《长征行》中的写作力求体现历史性，体现“信史”的严谨性、客观性、求实性，在一些历史问题、党史问题上，作者以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方式，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

比如，作者认为，长征是“3+1”（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长征的目的地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先后经历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搏斗、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思想的对立、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的相互矛盾。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贯穿于整个长征历程。

在“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一节中，作者提出：要将长征的原因同作出长征的决策加以区别。进行战略转移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但不能说战略转移的决策是错误的。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跟准备充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

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石仲泉在河南信阳“走走党史”

在书中“应当怎样评价遵义会议”章节中，作者提出，遵义会议是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不能只是孤零零地讲遵义会议本身。因为在遵义会议前后我党召开了不少会议，可称之为“遵义系列会议”，这为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之后的几个会议又为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8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书，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石仲泉的《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其中也介绍了这些具有较大创新性和学术意义的新观点。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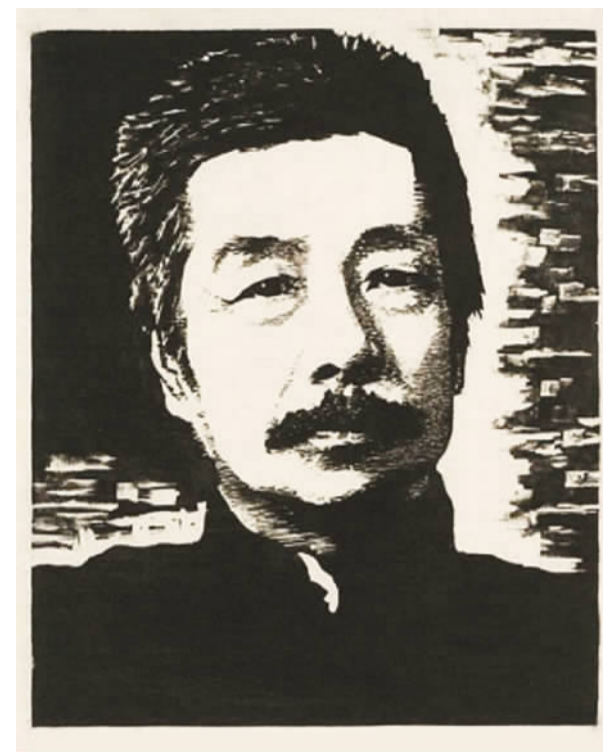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日。鲁迅生活于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关键阶段，以深邃的眼光和无畏的精神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他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文化伟人。

鲁迅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代表者。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薄薄的3本，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他对中国人精神麻木的揭示，入木三分，让人灵魂颤栗；将火一样的激情隐藏在冰一样冷静的叙述中，体现出卓越的艺术技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笑中含泪的艺术描写体现出大艺术家的大悲悯、大情怀、大境界。散文集《朝花夕拾》在回忆中纵横古今中外，既诙谐幽默，又尖锐泼辣。散文诗集《野草》不足100页，融深刻的思想与奇特的形象于一体，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鲁迅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杂文这种风行一时、流传至今的独特文体。他的杂文集多达15本，“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弊常取类型”。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拥有广泛的读者。

鲁迅是大翻译家。他是现代“直译”论者的代表。他认为翻译要体现原作的生气，输入外国句法，以丰富汉语的表述。对中国新文学建设而言，翻译有时比创作更重要。他翻译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大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翻译了苏联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翻译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有人统计，鲁迅一生翻译过14个国家的105位作家的作品，总字数达300万字以上，与他文学创作基本相当。

鲁迅是国学研究大师。他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史料《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他校订的《嵇康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考据的朴学传统而发扬光大。鲁迅还校订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云谷杂记》《岭表录异》等。鲁迅一生搜集的各类金石拓片达5100余种，6000余张。

鲁迅不是美术家，但他对现代美术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位深学家。鲁迅在教育部时主管美术和博物馆，他制定美术和文博事业发展规划，讲授美育，保护文物，组织儿童艺术展览；他和同事一起设计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徽；应蔡元培之邀设计了北京大学第一个校徽。鲁迅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开拓者，他对书刊的封面、插图、版式设计等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集和他编辑刊物的封面，大部分是自己设计的。鲁迅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之父，以他战斗的“力之美”美学思想



鲁迅 颜仲 1959年作

难忘鲁迅

张云龙

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为新兴木刻指明了方向。

鲁迅不以书法名世，但鲁迅的书法别具一格，被称为“鲁迅体”。鲁迅50年间幸存下来的手稿有一万多页，他的书法风格与其金刚怒目式的杂文完全不同，藏头护尾，温文尔雅，不急不躁，中正平和，表现了鲁迅性格的另一面。郭沫若评价说：“融洽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牵，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

据我国权威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显示，《鲁迅全集》不仅名列中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文化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一名，还进入其他5个学科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的前10名，成为影响力最大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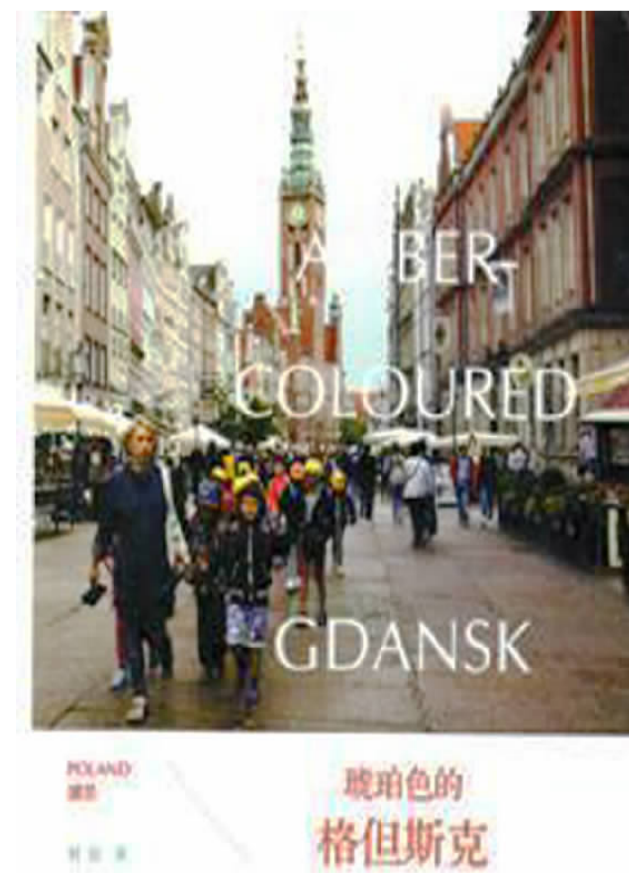
鲁迅去世时就被称为“民族魂”，后来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今，鲁迅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血肉。不管我们如何评价鲁迅，我们已不可能绕过鲁迅。

鲁迅去世时，作家郁达夫撰文《怀鲁迅》，其中有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所以，读点鲁迅吧。鲁迅并不易读，但只要读进去，就绝不会空手而归。

建立面对全世界的“日本战犯审判文献”资源库

10月1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之际，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开题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这一项目是对原有基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日本战犯审判”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它将首次以数据库形式，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日本战犯审判文献进行最全面的集中聚合、整理、研究，建立一个资源丰富、功能齐全、获取开放、使用便捷的资源库，实现日本战犯审判文献的集中式整理和一站式检索，通过全文检索和智能化处理，对档案资料、图书报刊、影音资源、照片海报、函稿日记等各类文献进行全方位揭示、多维分类和关联聚合。国图出版社最近影印出版的《丸之内审判文献汇编》《伯力审判庭审判记录》《二战日军战史资料汇编》是该工程的第一批成果。（小章）



开满鲜花的缤纷窗台，随处可见拉小提琴的窈窕姑娘……盛产琥珀的波兰格但斯克，本身也晶莹剔透，恰如“玉碗盛来琥珀光”。

普普通通的松柏脂液，掩埋在地下千万年后，石化成琥珀。当它还是液体时，各种生物在其中来去自如；当它固化成珍宝，也就留住了包裹其中的生物的千姿百态。格但斯克，也同时包容着最古老和最时尚的欧洲文化。

记者杜京写的《琥珀色的格但斯克》（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600多页的“大部头”，比砖头还厚，但是占了一多半篇幅的美不胜收的图片，又令阅读轻松惬意而意味深长。淡淡墨香间，异域风情的城市建筑会让你沉醉，静穆庄严的各式教堂会让你冥想，而见所未见的蔬果美食则会勾起你食指大动，热情奔放的街头歌舞又将把你带进一个现实的童话……在书中你能看到记者的好奇求知、严谨准确，也能看到作家的敏锐细腻；同时还有摄影家的独特视角。

格但斯克只能算是波兰的边陲之地，并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却地杰人灵。世界上最好的终年深水不冻港使它成为商贸繁盛之地，千年来始终保持着与世界的密切交往。虽然在历次战乱中几度衰落，但在每次衰落之后不久，都能利用它的区位优势，很快恢复繁荣。繁盛的海运和商业成就了它的包容性，诞生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科技巨人。17世纪享誉世界的天文观测家赫维留、华氏温度创始人华伦海特、19世纪的哲学巨人叔本华、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于是我们明白，它能孕育“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波兰前总理、欧洲理事会现任主席图斯克唐纳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

让“丝绸”与“琥珀”相连

唐小可

年轻的市长鲍威尔·亚当莫维兹、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琥珀收藏家卢茨·勃勒达、滨海经济特区“红掌门人”特蕾莎·卡马斯卡、女记者妮妮·雅科夫斯卡、留学籍但斯克音乐学院的3个中国女孩……许许多多杰出、或普通的人物穿插书中，栩栩如生。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对话，杜京巧妙而动听地向读者讲述着格但斯克的故事，讲述着格但斯克厚重、传奇的历史和美丽、辉煌的现实。

“古色苍茫”的旧城区、静静流淌的摩托拉瓦河、巨轮穿梭的格丁尼亚港、阳光下的马尔堡、长街上古老的贵族“宫殿”、“魅力无穷”的圣玛利亚大教堂、有着漫长历史的莎士比亚剧院、享誉世界的波罗的海肖邦爱乐乐团、百年历史的名牌学府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欧洲最好的球场”琥珀体育场、大街上的歌舞和琴音、洒满阳光的小小“酷儿甜品店”、“浓缩着格但斯克灵魂”的金箔酒……一幅中部欧洲的现代风情画在眼前缓缓展开。

这幅现代风情画的东端连着中国。格但斯克早在17世纪便通过荷兰的航运开始了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古“丝绸之路”和古“琥珀之路”曾经交叉。

书中写到的近百位人物，几乎无人不谈起中国。言谈中有好奇的求知、诚实的赞美，也不乏深沉的思考。

瓦文萨：我特别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巨大改变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走什么样的路，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的。

谈起为何对上海“情有独钟”，不苟言笑、以“冷峻”著称的“欧盟总统”斯图克笑了：格但斯克与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有一颗成为贸易中心的雄心，“而不是野心”。

格但斯克市长鲍威尔：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的女儿或者儿子正在学习中文。在格但斯克，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学习中文大有前景。在我看来，汉语是世界流行的语言。格但斯克大学已经成立了中文系。

88岁的汉学家爱德华的家居布置则“很有中国味”：墙上挂着梅、兰、竹、菊木雕，还有老人亲手绘制的中国画“寿星老人”。

只要彼此真诚，心，是能相通的。杜京在努力把“丝绸之路”与“琥珀之路”连接在一起，把中波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